

Mc
Graw
Hill
Education

媒介文化研究译丛

体育、文化 与媒介

不羁的三位一体

(第2版)

[英] 大卫·罗 著
David Rowe
吕鹏 译

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Second Edition

Mc
Graw
Hill
Educa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体育、文化 与媒介

不羁的三位一体

第2版

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Second Edition

【英】大卫·罗 著

David Rowe

吕鹏 译



北航

C169015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G80-05/51

028300410

David Rowe
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Second Edition
EISBN: 978-0-335-21075-6
Copyright © 2004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Asia)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3 by McGraw-Hill Education(Singapore)PTE.LTD.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Limited.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2013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所有。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8053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英)罗(Rowe, D.) 著；吕鹏 译。—2 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

(媒介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302-33029-5

I. ①体… II. ①罗… ②吕… III. ①体育—文化—关系—传播媒介—研究 IV. ①G80-05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9078 号

责任编辑：陈 莉 蔡 琦

封面设计：周晓亮

版式设计：方加青

责任校对：曹 阳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9mm×230mm

印 张：22.5 字 数：331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5.00 元

产品编号：047928-01

媒介文化研究译丛

编委会

主 编

周 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支庭荣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刘 涛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吕 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吴 靖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姜 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雷蔚真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丛书总序

20世纪以降，中国开始了文化借鉴的漫长过程，“五四”时期的西方文化论说不断被介绍进时代急剧变化的中国，至今的许多文化变革都要归之于“五四”时期，所以“五四运动”时期不仅是文化革新的时期，也是文化研究借镜的重要时期。而接续这一风潮的当属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著作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引发的观念变革一点也不亚于社会革新。由此，文化研究迅速成为一种极具活力的批判范式，并且成为一种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基质是批判，然而这里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批评或纯粹的论战，而是意在接近文化文本的多重样貌，以及探讨其在社会和政治脉络中的文化后果。这一时期产生许多打开视野看待社会文化促发文化前行的论说者。无疑，文化研究是一种解释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认识过程，也是建设性的梳理理论的过程。在理查德·约翰生那里，文化研究被认为是一种炼金术，它对应的是生产有用知识的一个过程，其功能就是以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视角对诸多文本现象进行理论提炼。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自然不是问题，但文化研究的深入化却是21世纪亟待把握的难题。已经有了丰富视野和良好基础的学人们，需要更为多样的借鉴对象。文化研究的深入则是一个有待积极看待的对象。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批评理论范式，文化研究关注文本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文本与作者的关

系，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文本意义生产的权力运作机制，等等，都有待新的积极态度进行探究。纵观文化研究史，最初的批评对象是文学文本。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学者发展了利维斯所强调的文化的社会性批判功能，将文化研究从文学文本转向了日常生活文本。文化研究的文本对象延伸到一切有意义的文化产物，不仅包括电影、音乐、摄影、时尚、游戏、粉丝等普通文本对象，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行为、运动、仪式等社会性文本对象。由此可以说，当下生活的文化研究气质，是广泛包容而多元论说的疆域。

当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文字文本拓展到某种普泛的意义本文时，大众媒介无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本对象，并且酝酿着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在以往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尽管已经有不少出色译著，但显然，大众文化的领域不断扩大而新媒体时代所提供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当今，媒介正在以一种强劲而微妙的方式对现实世界进行系统的改造与重构，传统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进化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存在事实。媒介化社会是工业革命劳动分工的直接结果，强调大众媒介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影响、改变和支配。媒介不单单意味着一种传播载体，而且制造了我们时代最逼真的社会景观和文化生活，同时也构建了一整套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公共参与方式。在新传媒环境格局中，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化过程，日常生活中的符号话语、视觉景观与象征体系一起被抛入新传媒环境中，媒介化生存成为一种逼真的生存事实，这使得媒介之于现实的影响和意义被特别地凸现出来。关注不断加速的新媒介传播，给予新的文化研究的论定，不仅是中国文化需要增补的课题，也是世界文化研究重心所在。而显然，域外文化研究无论是对于大众文化还是新媒体出现引发的文化转向都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借鉴依然是切要之举。

延伸而论，当前的媒介批评与理论图景中，文化研究的诸多传统命题(如阶级、性别、种族、身份、话语)获得了一种新的诠释体系，媒介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极具理论思辨张力的研究领域。媒介不仅是研究的客体，而且作为一种认知环境出场，成为政治行动和社会批评的场域。纵观西方的媒介文

化研究史，诸多批评话语纷纷围绕媒介“大做文章”，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布尔迪厄、斯图亚特·霍尔、德里克·德克霍夫、尼尔·波兹曼、艾伦·赛特、戴维·莫利、约翰·菲斯克、詹姆斯·卡伦、罗伯特·艾伦、米米·怀特、丹尼斯·麦奎尔、斯图亚特·艾伦等文化学者从不同的批评视角接近媒介以及以媒介为交往中介的“社会”，并且形成了诸多成熟的研究学派和理论表述，这无疑为国内的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我们已经在关注，但需要的是深入的阅读和全面的认知。有为者在这一时代自然还不少，但也需要学术界给予集纳和提醒，将西方世界的知识文化层面的思考译介进来，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中国和世界的密合度在其成为“地球村”一员时更为明显，而媒介文化研究的需要则是无距离的盼望。作为当代知识生活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研究领域之一，媒介文化研究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研究范畴，它以媒介及其建构的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围绕媒介文本进行概念诠释与理论建构，重点思考的是批评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致力于探讨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机制与权力运作机制。因此，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媒介文化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研究的性质、深度与范畴，使得媒介研究获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思想意识维度和批评思辨维度，传统的文化研究命题在媒介化社会时代得到了全新的理论关注和诠释视角。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媒介文化研究一直都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研究命题。必须承认，无论是体系还是前沿，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著作可谓卷帙浩繁，形成了一系列相对成熟的概念、理论、模式与体系。许多国际出版商都推出了相应的媒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如 McGraw-Hill 的“文化与媒介研究系列” (Issues i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Routledge 的“文化与传播研究系列” (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和“文化与媒介研究系列” (Routledge Research i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等。在西方如此丰富的理论资源面前，如何进一步推动国内媒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西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国内的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了相应的媒介文化研究译丛，这极大地拓展了国内媒介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而我们需要更为积极的推动和提振。

以上阐释其实就是本套丛书的设立要义。学术的脚步从来就有先后差别却没有截止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内外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一些年轻的研究者难能可贵地提出策划并组织翻译这套“媒介文化研究译丛”，在学术界看起来无论如何评价，都需要给予精神的鼓励。其实这既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科学化的需要。为了真正遴选出有价值的西方学术著作，我们的选择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第一，强调对媒介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的译介。遴选著作能够体现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水平，能够提出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新体系，并且给出了充分的科学论述。第二，重视对最新媒介文化研究议题的译介，比如对体育、儿童、游戏、博物馆、明信片、移动文化、另类媒介、少数人群体、多模态信息、文化记忆、社会恐惧、第三空间、虚拟身份、视觉修辞、媒介叙述、媒介劝服等“文本”对象的拓展，而且所有议题都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最新思考成果。

老话自然要提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译介工作是一件艰苦但有意义的工作，但有人去做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事情。相信对于推进国内外学术对话而言，译丛将会产生积极的反响，允诺作为主编未必称职，却期望能够推动文化研究的拓展，希望这套“媒介文化研究译丛”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机运。

是为序。

周星

201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学院院长，北京市重点教学实验示范中心“传媒与艺术实验中心”主任。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中文版序言 与致谢

当《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的第2版在2004年出版的时候，我对中国，尤其是对其媒介-体育关系的了解，还是微乎其微的。当时，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大陆(不过，偶尔会去去香港)，虽然早在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我已开始越来越多地对中国的体育和媒介进行思考了。这委实是我的一个不足，尤其是前几年我还特别研究过全球化的问题。不过，像研究和学术的很多领域一样，媒介、体育与文化研究似乎一直是以西方为中心。这正是詹姆斯·卡伦和朴明珍(James Curran & Myung-Jin Park, 2000)编著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进行批评的基调，而我随后也将其用于媒介体育研究(Rowe & Gilmour, 2008)。本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加里·惠内尔(Garry Whannel, 2013)，在其最近关于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的文章中，也表现出了对代际、性属、地理以及其他问题的关注。我们曾就其文章的草稿私下进行了交流，作为对我的看法的回应，惠内尔评论道：

正如大卫·罗(David Rowe)所建议的，我们也应该考虑下我们是谁。那么，在我自己对此领域的叙事建构里，必须要承认，“我们”最主要是指(但并非仅仅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西方人以及异性恋(p.15)。

因而，在其他一些进展中，包括媒介体育研究的全球化和跨国化，既需要对分析者的定位进行批判而自反式的再思考，也需要对他们要分析的内容的空间和主题进行更密切的关注。

如果起初我没有做下决断要“奔向中国”(go to China)的话，那么当书出版没有多久，我的出版商告诉我它会被译成中文的时候，就似乎是中国正“走近我”(coming to me)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并且直到数年后我才收到十分令我欣喜的消息，《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现在可以以中文的形式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了。此时，我对中国的认知已多了起来，并两次访问了中国大陆：一次是受中国传媒大学罗青教授(礼尚往来，她也回访了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大学)之邀，另外一次是作为成都体育学院魏伟博士的客人——我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同事所提供的机会。在其中一次访问里，我还得到机会参观了我之后写作的(Rowe, 2013)“经济上的奥林匹克”(Economic Olympics)——无与伦比的上海世博会。这些“实地考察”(Site Visits)所提供的加强对话的机会对于互惠学习——这正是学术交流的精髓——来说非常重要。

虽然我远非中国体育、文化与媒介的专家，但我对其环境以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背景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已有了较好的领会。对中国，或者大体上来说亚太地区的关注，是我较为近期的作品中一个很强烈的特色，这是因为，正如在研究和学术的其他领域一样，它是媒介与体育全球发展一个愈发重要的力量。从专门著书、范围更广地分析全球体育与媒介(诸如Rowe, 2011; Hutchins & Rowe, 2012)到专门研究中国体育、媒介、历史、文化和政治(比如Rowe, 2008, 2012a, 2012b, 2013; Rowe, Gilmour & Petzold, 2012; Rowe & McKay, 2012)，我更近期的作品既涉及了中国媒介体育，也受到了与中国大学媒介研究者和学者同好日益增加的讨论的影响。后期出版的某些材料在此做了索引，以表明为了给《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打基础，我是如何与此同时竭力扩展和再思考先前已实施的分析与实证研究，以呼应对中国语境以及中国自身的世界影响的进一步认识的。

正如所言，在这项工作中，参与到富有成效的对话中是很重要的，不能

进行独白——西方学者用这种独白向被动的受众施与知识——这种传播关系在批判媒介研究中已被挑战了30多年[米勒(Miller, 2009)的很多著作已经证明了]。虽然与其中国同行比起来,西方学者对体育、文化与媒介的分析还处于相当“领先”(head start)的地位,但这中间的差距正在急速地缩小。中国媒介体育学者以及数目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对此领域愈发精益的了解让人印象深刻。在会议与研讨会中与参会人员讨论时,我已强调需要把中国体育媒介体系作为进口和本土的媒介技术和文化实践的混合物来进行理解与分析。在当代研究与学术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主题之一是,随着中国媒介体育体系的成熟,中国何时能够创新出自己的方法,并且其又能反过来影响其他媒介体育体系。

因而,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本书的主要概念——的当前现状以及可能的未来的共同理解来说,中国会提供一个极大的帮助。中国地域之广阔以及发展之迅速生成了在媒介体育世界——虽然技术总具创新性,但仍倾向于遵循相似的套路来呈现和解读——中做些不同之事的能力。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新工作要确保权力问题处于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之中,也不能忽略体育世界和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更广大的社会-文化模式之间复杂与动态的关系。

下面这些问题提出了媒介体育生产和媒介体育文本的意义以及利用的境况。它们询问谁拥有及控制媒介体育,以及谁因其实质的权力结构而获利及受损,还有国家和资本实践是如何通过它来起作用的。它们质问价值是如何附加到与体育相关的各式媒介化了的社会主体上,这些主体包括性别、性属、“种族”(racial)、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它们调查媒介体育员工——如体育编辑和记者——的专业实践,以及其与批评性调查、腐败的曝光等实践相关的责任与表现。它们评估体育迷群特性的变化,以及新的网络化的数码媒介技术可以创制新的粉丝配置与可能性、从而被动员去挑战媒介体育中模式化的机构权力的方式。这些仅是中国说中文的媒介体育学者以及全世界的学者可以发掘的方法中很小、很基本的一个样本。随着21世纪网络数码媒介体育大量出现所带来的全球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的改变,会有大量的空间来对

序言与致谢

(第2版)

有机会再版一本书，既极具诱惑力，又是件很棘手的事。最大的优势是作品可以更新和强化，对书中的一些令人难堪的部分可以进行“粉饰”(airbrushed)修正。但同时也存在着原作品精神及创作的历史情境的保真度问题。以世界流行音乐、我排位第一的学术至爱为例，这就类似于用数码技术重新灌录以使唱片声音更清晰、无脉冲干扰并更具时代性。结果是，虽然技术上是先进的，但一些无形的东西可能在混录中丢失了，通常这些独特性和显著的东西是这个音乐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本书虽不是曲调的集合，却是历时五年多对“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media sports cultural complex)的变化，以及对文化与媒介研究内部集中方式的分析进行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它既代表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诸多变化的反应，也代表了作者对第1版曾关注过的几种最重要的议题的客观回应。

我已尽力避免对原来的文本进行强迫性的修修补补，但是，面对实施一些细致调整的诱惑，我却并非总能成功抵挡。在调整中我承认，若有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五年后会是什么样，绝大部分人做事的方法会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试图尽可能多地记录和审视媒介体育的变化，并分析自从1998年我完成初稿后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些结果使我多么希望我是在一个更细化的、更少于变化的当代学科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这样就不至于

每次我只是眼光稍微偏离一会儿就发生这么多的变化。相比之下，遗传工程和纳米技术就是我心目中比较宁静的研究领域。我想列出的主要变化包括：

- 媒介体育在政治经济中的新发展，尤其是媒介引燃的体育的金融繁荣的终结，一如人们认为互联网行业有利可图一拥而入，但泡沫破灭后，却损失惨重并使行业也重新洗牌。
- 媒介体育科技、消费与使用的变化在第1版后记中简单讨论过，这一版需要详细阐述未来情形并勾勒“媒介体育文化复合体”。
- 这一领域中的新理论和实证工作为对体育、文化和媒介之间关系的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本版会对第1版中接收、受众、文化公民权以及观众等概念的讨论进行扩展。
- 对近期大型体育赛事[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2年世界杯(World Cup)]以及新的媒介文本[如电影《挑战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①和《我爱贝克汉姆》(*Bend It Like Beckham*)^②]的反思现可用于文本分析。

通过这些增加的内容，希望能够使第2版对跨专业学科如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传播研究、体育研究以及休闲学的众多研究者、学者和学生有所帮助；也能引起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和史学等学科领域的注意，使其关注媒介体育的主题及其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我也重新编辑了一部著作《批判读本：体育、文化与媒介》(*Critical Readings: Sports, Culture and the Media*, 2004)，它与本书有着相同的结构，这部书给读者提供的理论基础充分而富

-
- ① 《挑战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华纳兄弟(Warner Bros.)1999年出品的一部体育剧情片，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主要讲述了一个橄榄球俱乐部及其生活圈发生了危机，然后经过团结合作而成功解决危机，使球队继续获胜的故事。——译者注
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 ② 《我爱贝克汉姆》(*Bend It Like Beckham*)，是由英、德、美联合制作，2002年上映的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运动剧情片，顾伦德·查达哈(Gurinder Chadha)导演。主要讲述一个居住在英国的印度裔少女杰西(Jess)完成足球之梦的故事。

有启发性，利用这本书读者可以自己在研究领域中进行批评分析的探险，并一如既往地为该领域所着迷、震颤和吸引。

一本书永远不会是作者单独的创作，我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众多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我的这本书会显得多么贫乏。有一些人，如Liesbet van Zoonen、Richard Giulianotti和Alina Bernstein，他们这些年来和我之间跨越国际的知识分子同志情谊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在文化工业与实践研究中心(CIPS)以及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前休闲与旅游研究系，“合作”与“欢乐”是两个重要的座右铭。我紧密的合作者，尤其是Deborah Stevenson、Geoffrey Lawrence、Jim McKay和Toby Miller，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我创作的灵感之源。我也要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和纽卡斯尔大学的授权支持，他们使支撑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证研究工作得以实现。人中之龙Peter Wejborra出色地完成了研究助理工作。

在开放大学出版社(Open University Press)，Stuart Allen，一如既往，仍是个令人愉悦、有建设性的丛书主编，而Justin Vaughan在他离职前也是个十分得力的出版人。在绝望之时招募的Cathy Thompson及后来的Chris Cudmore，在那些多得离奇的黑暗时刻用他们娴熟的网络技术平复了我的情绪。我也感谢阅读了本书第1版，对其发表评论以及直接联系我对部分内容进行讨论的人们。这些反馈对于写作本书的第2版来说都是无价的，也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充分展开批评分析讨论的意识，这对于本书的再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动力。

最后我想说，在当今社会，没有谁能在周围的人不牺牲和不付出的情况下还能成为将学者和作者集于一身的人。我感谢我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家人对我一直离家在外的宽容。对于我的两个孩子，Maddy和Dan，我希望他们充满罪过的键盘控父亲已经使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教训，从而不会去重复我的生活，而懂得如何过一种值得称道的成人生活。

致 谢

(第1版)

写学术书的八成都是一个十足的受虐狂，自讨苦吃的爱好一定是这项工作最好的品质。得以真正地支撑作者写作下去的动力是，终有一天，这一作品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了。这本作者孤独地构思与创作的书，最终会成为一个社会产品。它是为这些可爱的人写的，没有这些人，这本书永远也写作不出来。

带着对有意或无意的疏漏的紧张，这一次我要谢谢那些我心中不可或缺的人：我在英国的家人，尤其是那些我以前没有感谢过的——Joanna、Oliver、Alex和Tony——以及我在澳大利亚永远都会被提及的家人——举世无双的Daniel和Madeleine。这次我要荣幸提及的老友新朋及同行包括Therese Davis、Grace Davis、Sue Dean、Mick Dwyer、Geoff Lawrence、Geoff Lawrence、Helen Macallan、Kevin Markwell、Jim McKay、Toby Miller、Chuck Morris、Jules Pavlou Kirri、Deborah Stevenson、Alan Tomlinson、Garry Whannel以及Dave Whitson。

我也要谢谢另外一些身边的同事，他们的工作堪称典范。行政双人档Shelagh Lummis和Kerry Beaumont帮了我很多，我将一生铭记于心。Richard Lever也在一些研究的重要时刻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研究协助工作。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研究管理委员会对体育记者研究提供了慷慨的

资助。最后要说的是，Stuart Allen是个意气相投的丛书主编，Justin Vaughan是个鼓舞人心的出版人，而Gaynor Clements则是个有办法让人永不气馁的编辑。我希望本书能满足他们脑海中的某些合理预期。

大卫·罗

它们进行描画和再定义。

最后，在此序言中，我想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吕鹏博士，他严苛的翻译以及对我在行文中经常运用方言土语的容忍，都堪称典范。我希望对《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第2版的中文翻译，将能够有助于形成对这一持久迷人的主题的新的对话和讨论，从而跨越诸多语言和文化上的边界。

大卫·罗

参考文献

Curran, J., and Park, M.J.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Hutchins, B. and Rowe, D. (2012) *Sport Beyond Television: The Internet, Digit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Networked Media Sport*. New York: Routledge.

Miller, T. (ed) (2009) 'My Media Studies' Special Issue of *Television & New Media*, 10(1): 5-174.

Rowe, D. (2008) 'The East-West Balance in 21st Century Media Sport', in Q. Luo, C. Wen, F. Liu Fenghai, X. Zhou, J. Zhao, R. Hu, X. Liu, and P. Liu (eds) *Asian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2007: Sports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4-27.

Rowe, D. (2011) *Global Media Sport: Flows, Forms and Fu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Rowe, D. (2012a) 'The Bid, The Lead-Up, The Event and The Legacy: The Global Cultural Politics of Awarding and Hosting the Olympics' ('Special Issue: Olympic and World Sport: Making Transnational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3(2): 285-305.